

袁中郎说过的一则笑话

李荣

林语堂先生最为推崇的明代才子袁宏道（中郎），曾说过一个有关“太行山”的笑话。而我最早接触到这个笑话，却并非从袁氏那里来，而是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，最后才绕回袁氏那里去。现在想起来，也觉得很有意思。

记得最初是由偶阅知堂辑订的《明清笑话四种》而来——知堂辑订的这个笑话册子，其第一分是明赵南星的《笑赞》。这个笑赞的特点，就是每一个笑话的后面，都有一段赞语。就像以前读古希腊的《伊索寓言》，每一个寓言后面，也都有几行“这故事的意思是如何如何”的话。这《笑赞》的第一则，便是《太行山》，整个是这样：

一儒生以“太行山”作“代形山”。一儒生曰：“乃‘秦杭’耳。”其人曰：“我亲到山下，见其碑也。”相争不决，曰：“我二人赌一东道，某学究识字多，试往问之。”及见学究问之，学究曰：“是代形也。”输东道者怨之。学究曰：“你虽输一东道，却教他念一生别字。”后面的赞语曰：“学究之存心忍矣哉，使人终身不知‘太行山’，又谓天下人皆不识字。虽然，与之言必不信也，盖彼已见其碑矣。”

当时读了之后，完全是“空诸依傍”，也不知它的前因后果以及来龙去脉，只是结合着那个赞语，写了一段读后感言。如今翻找出来，却是这样的一段话，自己看了也觉得颇为“新鲜”：

读笑话，总要处处理解得通透了，这才笑得爽快。即使大体都明白了，却有小地方有点不解，那在大笑的笑声里，却难免杂一点“疑惑”的影子。别人看不出来，自己心里最是晓得。比如这一则，初读第一遍，大旨当然是马上明了。笑话的眼全在太行山“太行”两字的多音上面。行字可读形，亦可读杭，那没问题。太字读泰，亦是无疑，那么读代，则何解？后来，想了几遍，大概是大与太字，古写相通，那位暨儒生亲眼看见的古碑上面，也许那个太行的字面却是太行，于是他认了一个白字、读了一个别音，却自以为眼见为实，哪里会有错？笑话里的意思到底是是否就是这样，也没有确实把握，姑且这么理解。

而这一则实在的“笑点”，却是那两个位儒生找去让他当个裁判的学究的一句话，说是：“你虽输一东道，却教他念一生别字。”似乎以“一东道”与“一生”相较，总之是划算。那后面的笑赞更是说得妙：“学究之存心忍矣哉”。这个“忍”字下得实在是让人拍案，表面看着是不忍之心，不愿意来点破他读了别字，不让他尴尬。而其实是残忍，要让那个儒生终身不知“太行山”，而且还要让他认为天下人皆不识字，都把太行山读错了。这实在是在残酷地“制造”一个笑话”。不过，这个笑赞却也是说得周全，从学究的“忍”又说到儒生这一面，设想一下，就算耐心地说服他，他一定也是不信，因为“彼已见其碑矣”，他是根本的不转移，或者此亦可谓同样的是一种“忍”或者“韧”也。

毕竟是这样地想一遍，虽然想过的具体内容，日子一久也慢慢淡忘了，但这个笑话故事却是记住了。后来有一阵子，香港董桥先生的小品文十分风行。他有一册《英华沉浮录》，据董桥先生自己说，“是以语文为基石的文化小专栏”，每篇的篇幅都不大，一般五六百字，多者也不过一千多字而已。读起来不费力，却也是耐读。就是在《英华沉浮录》的“跋语”里，我见到了“久违”的“太行山”，被董桥先生引用在文章之内。在这里，才知道是袁中郎说过的一则故事。而且那故事的行文出入，也与《笑赞》里面所载小有出入——

董桥先生引述的故事是这样：昔有书生携一仆入太行山，仆见道上碑字，误读为“太形山”。书生笑说：“杭也，非形也。”其余的此书生与仆找到学究“赌输赢”以及学究所谓“教他俗子终生不识太行山”的话，大致都是一样。而董桥先生接着说了一段话：“我没想到读书可以读到这样彻底，这样较劲，故意要那仆从一错到底。知识人的心胸沦落到这样狭窄的景况，也真敢兴。”

读了董桥先生的话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没有径直地向袁中郎的那个方向走，却是“绕了个远路”。在董桥先生笔下“势利”“狡黠”和让人“一错到底”这几个意思之上，再向更为刻毒与阴苛的方向联想开去，便莫名地联想到了更远的地方了。那便是古文的习见读本《古文观止》开首第一篇，《左传》里的一段，取题曰：郑伯克段于鄢。

郑伯对他的兄弟共叔段，有一句出名的怒其恶行的愤愤语，便是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。但《古文观止》编者在文中所下的按语，却认为这表明了郑伯的刻毒，任其兄弟“多行不义”，不加阻止，等着他“自毙”。在《左传》的本文中，于多行不义这话之后，郑伯还加说了一句曰“子姑待之”，犹今语所谓“等着瞧吧！”，那就更不像是愤愤语，而是有点玩之掌间的意思。《观止》的按语在这里简直是直斥郑伯：“待之云者，唯恐其不行不义，而欲待其行也。庄公（即郑伯）之心愈毒矣。”从这个角度，前后贯穿

起来看，那么郑伯一步步“养成”兄弟之罪，待其罪恶“成熟”，则师出有名，正可以治其罪，那一条轨迹倒是十分分明也。

联想到此，竟从一则笑话中的让俗人“一生不识”到了《左传》中刻毒的“子姑待之”，自己也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。这时候才意识到，这一则由袁中郎说开去的笑话，在袁氏那里的“本来风光”到底如何，还未有领略。于是，下了决心，把袁中郎两大册的《袁宏道集笺校》上海古籍版翻找了出来，一卷卷地阅看，在卷五十四“未编篇之二——杂著”中，有一篇《题陈山人山水卷》的短文，这正是由袁氏说开的这一则笑话的出处。此文是这样：

陈山人，嗜山水者也。或曰：山人非能嗜者也。古之嗜山水者，烟岚与居，鹿豕与游，衣女萝而曳芝术。今山人之迹，什九市尘，其于名胜，寓目而已，非真能嗜者也。余曰：不然。善琴者不弦，善饮者不醉，善知山水者不岩栖而谷饮。孔子曰：知者乐水。必溪涧而后知，是鱼鳖皆哲士也。又曰：仁者乐山。必峦壑而后仁，是猿猴皆至德也。唯于胸中之浩浩，与其至气之突兀，足与山水敌，故相遇则深相得。纵终身不遇，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，是之谓真嗜也，若山人已已。

其后便是那“太行山”一篇故事，至学究“宁可负使公失一贯钱，教他俗子终身不识太行山”的话，袁中郎收了一个文章的结尾曰：“此语极有会。想山人读至此，当捧腹一笑也。”

这样看来，袁中郎毕竟是才子风流，生性中正平和，未有过于激烈的气味。在他眼里，学究的那一句“教他俗子终身不识太行山”，似乎并不带有“势利、狡黠、心胸沦落到狭窄”的意味儿，更谈不到如郑伯那样的“阴毒”，反倒是略略对之有点儿会心，好像是说：非能嗜者与真嗜者之间，要能够相通实在是太难，无可奈何之间也只能“两相平行”，不必硬是要去寻找相交的地方。让非能嗜者“终身不识太行山”，不作“点破”的功夫，也未始不是对于真嗜者的一种保全吧。此笺评辑录了陈继儒评文“此语极有会”句云：“可为知者道，难为不知者言，正如此。”说的也正是同一个意思。

当然，由袁氏说开的这一则笑话，其原始出处或许更为古老了，至少在宋李之彦的那一册《东谷所见》中即见记载，那最后的案语亦谓：“太行山老儒之言颇有味，今之有真是非，遇无知者，正不必与之辨。”看来，从这一则笑话故事“说开去”的地方，原就没有什么势利甚至阴毒的意思。“相隔”，有时实在是一件毫无办法的事情，只能说我们都是生活在人间，这或者便是人间所应有的吧。

附识：

此笺校本的正文中“仆见道上碑字，误读曰‘大形山’”，非一般引文作“太形山”。《东谷所见》之中，亦是“太行山”与“太行山”之辨。这与知堂辑本《笑赞》中的“代形山”相比较一下，或许本人初读时“空诸依傍”所作有关“大”与“太”的那一点儿猜想，也算是找到一丝“并非依据的依据”吧。

一代名士唐大郎

张伟

大戏院办公室内的唐大郎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卡尔登

但喜欢他诗文的人却很多，其《高唐散记》《定依阁随笔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等都是当年的名牌专栏，很受读者欢喜，以致“看了大郎再睡觉”成为当时的一句流行语。早在40年代，就有读者自发搜集张罗，有意为他出版文集；张爱玲更是直接建议他将书命名为“唐诗三百首”，并且认为“这个名字来得浑成”，她还表示唐大郎的一些打油诗是“赚人眼泪之作”，不能舍弃。大郎擅长写近体诗，写得最多的是七绝，但不论是五言还是七言，律诗还是绝句，都严格按照格律办事，平仄协调，对仗工稳，可谓循规蹈矩，一丝不苟。他的诗完全依照韵书押韵，偶有浑押或移韵，也必预先说明。如大郎写周信芳演《刘唐下书》的绝句：“行路登楼颇耐看，小锣紧打客心寒。郭城托出刘唐美，只在楼边与崩端。”被人誉为“戏好，诗也好，最能道出其迷人的神韵”（吴承惠语）。大郎对自己的诗也颇为看重。当年他在报上写过个专栏，名为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署名“高唐”，自注“高唐”两字作“高出于唐人”解。其自负可见一斑。

但如只是严守格律，那就不是唐大郎了，更可贵的，是在旧体诗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做了创新的努力，并且获得了相当成功。黄裳说：“他对旧诗有相当深厚的修养，对前人的业绩，甚至那一套严酷的声律都表示尊重，严格遵守。但他又蔑视一切僵死、腐朽的教条，有很大的勇气来加以突破。”可谓道出了大郎诗受人欢迎的真谛。他的诗，形式上纯属传统，内容上又绝对现代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生活，戏院、书场、舞厅、酒楼里的红尘世界，霓虹灯下铰光鬓影，红氍毹上悲喜人生，以及亲朋好友、文人艺人的身边琐事，都是他信手拈来的写诗材料。旧瓶装新酒，信笔吐真言，但语俗句，艳词乡曲，穿插其间，浑然一体，读来别有风味。他的朋友曾妙笔形容：“在他的笔下，市招如五芳斋，家常菜如咸菜豆瓣汤，电器如录音机，称呼如奶奶，俗语如抬杠、揩油，方言如交关、野豁，骂词如王八、叭儿，诸如此类，都可以入诗。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诗中还出现了‘老铅’‘皮蛋’‘哀’（扑克牌中的K、Q、A），还把Tango的大郎一生所撰诗文至少在300万字以上，而每篇诗文的字数一般都在五百字左右，如此一平均，其发表诗文篇数之多是可想像的；而且，大郎并不视自己文章为名山伟业，随写随刊随丢，生前竟然从未出过一个集子。这么多年，不断有人呼吁为唐大郎出版文集，但除了潘际垲、黄裳先生搜集唐大郎晚年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所作诗作，1983年在港岛为他出了一本薄薄的《闲居集》外，其他就一概付诸阙如了。

唐大郎自己虽然并不敝帚自珍，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

说话投机即朋友（木刻）沈雪江

人。”这是黄裳的观点。熟悉电影史的朋友都知道，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影坛上，文华影业公司是最让人高看一眼的，唐大郎在1948年初写的一篇文章中恰巧谈到了这一问题，并对自己有“文华”这样的一批朋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：

文华公司的编导阵容，如钢似铁，这是公认的事实，用不着我来替他们夸张，如黄佐临，曹禺，桑弧，在戏剧上的造就，都是超然绝诣。中国的电影戏剧，目下已由幼稚时期到了健康时期，他们都是功臣。他们以外，还有一个金山，最近我们看了《松花江上》的气象万千，我不能不钦服我的老朋友，十年来的努力，真有两下子。昨天是我愉快的一天，我同他们在一起吃饭，他们都同我很好，桑弧平时和我们常在一起，与佐临认识亦已多年，惟有曹禺相交不过一载，但他们对我的了解却是一样的。我是因为崇拜他们，由崇拜而生敬爱之诚，每次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有一种“虚荣心”，觉得我也是第一流的人物。

唐大郎一生为人，风流倜傥，率真洒脱；其撰文写诗，则感情浓烈，真挚清澈。柯灵写道：“刘郎是熟人，我自信多少还能了解他。他的好处是通体透明，没有一点渣滓。高贵也罢，鄙陋也罢，他从文饰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‘水晶肚皮’。才气使他狂放，而坦白使他庞大，如果有缺点，那是有时不免感情用事，趋于偏急。”这是知心朋友的评价。唐大郎对美和善的人与事物，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符铁年弟子朱尔贞小姐聪颖多姿，能书善画，是唐大郎经常来往的朋友。唐大郎有一篇文章写到他的微妙心态：

认识朱尔贞快三年了，近半年来，我们见面的时候比较多些，她一身怀着清才绝艺，又是风骨如仙，近她身时，就觉得秀气袭人，这样的小姐，是不会叫人起什么褻念的。有时在一起吃饭，她是傍着我坐，这时我常常有一种希望，希望跑来一个陌生朋友，经过一阵寒暄之后，忽然指着她，问我：“这一位是你的小姐？”当时我自然会加以辩白，但心里将是无限喜悦的；我以为能够范铸出这样一位小姐来，总是值得骄人的事。

唐大郎曾育有一女，但年幼即逝，其心中隐痛自然惟有自知，他曾有一篇文章写到这种怜女的心情：

我是没有女儿的人，近来之方常常跟我提，到了我们这种年岁，其实不应该再要什么女朋友，最好有一个长大一点的女儿，天生的漂亮，大方，没有事，就带着她满处乱闯，听相识的人见了她赞不绝口，这心境也是够愉快的。读了此文，再去回味他对朱尔贞的欣赏，体悟会更深一层。同理，他写才女周鍊霞，虽仅短短一句，但欣赏关切之情却溢于言表：“难得出一个周鍊霞，但她的丈夫是重利轻别离的远走台湾，她却耽在海上。”

1949年后，唐大郎先是在夏衍支持下主办《亦报》，过渡之后，进入《新民晚报》主管副刊，提出著名的三段论：上身思想性，中间知识性，下身趣味性。把晚报的副刊“繁花”等办得花团锦簇，大受读者欢迎。他在晚报上虽然时有诗文发表，但这一时期，他的作品集中刊登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，主要写了两个专栏，前有《唱江南》，后为《闲居集》，数量有六十万字之多，在海内外深受好评，也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，生前曾两次对夏衍提起：唐大郎在香港发表的组诗“是有良心有才华的爱国主义诗篇”。

唐大郎于1980年7月20日病逝，夏衍对他有这样的评语：“他的一生，是一个勤劳劳动、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一生。”可谓盖棺论定。8月2日，唐大郎追悼会在龙华火葬场大厅举行，治丧委员会由夏衍、赵超构、于伶、柯灵、陈虞孙、桑弧、吴祖光、费彝民等十八人组成。

唐大郎1908年9月18日出生在嘉定，今年正好是他诞生110年。

笔会